

从“柯桥实验”中汲取精神养分

□ 徐志伟

1987年9月至1995年7月开展的“柯桥实验”，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界的重大事件。“柯桥实验”秉承的教育理念和体现的教改精神，是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对于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带来深刻启示。

八年实验

1987年8月，原浙江省教委决定，在时辖9个乡镇、142万人口的绍兴县柯桥区组建教育改革实验区，进行“基础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大面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实验研究”教改实验（简称“柯桥实验”）。教改实验被列为国家教育科学“七五”“八五”规划课题，整个实验分为两轮，共持续了8年。实验以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积极适应、服务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的典型经验和模式。1990年7月，第一轮实验通过了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研究成果鉴定；8月，第二轮实验开始，定名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模式研究”，至1995年7月结束。1996年4月，第二轮教改实验成果通过专家鉴定并获得高度评价。

“柯桥实验”在基础教育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学校管理、考试评价、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探索。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经过“删、减、合、移、增”调整后，学生学习总量有所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得到控制，更加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更加符合义务教育性质任务的要求。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建设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跃学校气氛，开设了活动课、选修课、职业技术课，增强了学校生活对学生的吸引力，探索了农村教育培养农村有用人才的新路子。在考试评价和招生制度方面：实验区70多所中小学不参加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统考，也不组织对所属学校的统考，把考试权下放给各任课教师。改革高中阶段招生制度，上级有关部门将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专的招生名额切给实验区，实验区根据各乡镇当年初中毕业生数和对各乡镇初中办学

核心阅读

“柯桥实验”是一项在全国范围有重要影响的农村教育实验。8年“柯桥实验”，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规范教育教学管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深化招生制度改革、提升教育内涵品质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举措，在探索“轻负高质”的教育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柯桥实验”结束已经20多年，但它依然是教育界值得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当下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深刻启示。

水平的全面考核情况，再将招生名额分配给各乡镇初中，使学校摆脱了以升学为目标的桎梏，为教学改革“松绑”。在学校管理方面：实验区各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有的学校还探索建立学校董事会制度，从而建立起学校主动为社会服务和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新机制。

8年“柯桥实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观念发生了积极变化，学生全面素质有所提高。1991年9月，柯桥教改实验区成为全省第一个无流生区。通过教改实验，初步建立了一批特色学校群，学校教育质量获得了大面积提高，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新模式雏形初步形成。

深远意义

30多年前，许多农村学校把学生的考分和升学率高低作为判断教育质量的标准，不少做法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柯桥实验”率先向“应试教育”挑战，拉开了素质教育实验的序幕。

“柯桥实验”的精髓，就是要改变农村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的以升学为导向的状况，使其真正成为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柯桥实验”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比不少地区的基础教育改革先行了一步，符合中长期教改实验应有适当

超前性的要求。选定柯桥区进行教改实验有一定的代表性，1987年柯桥区人均工农业产值已经突破1万元，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当时柯桥区面临或提出的问题，很有可能是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实验取得成功，就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柯桥实验”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深化课程改革积累了本土经验，为推进素质教育提供了操作模式。当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教育改革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时候，它已经涉足教学改革领域，从教育改革的“外围战”进入了“深水区”。“柯桥实验”一度引领了浙江省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柯桥实验”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化了区域教育的理论体系，促进了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基础教育带有明显的区域特性，这项区域性教改实验成果，丰富了区域教育发展理论。“柯桥实验”本身是一项基于事实和证据的教育实证研究，对于促进教育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具有方法论意义。

现实启示

“柯桥实验”结束已经20多年，但它依然是教育界值得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当下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破解时代课题，回应人民群众期盼。“柯桥实验”在破解基础教育为促进人的社会化服务、大面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方面，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进入新时代，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可以说是人民群众对于高水平教育的渴望与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特别要注重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以更好的教育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启示之二：遵循教育规律，确立先进理念。参与“柯桥实验”的教育工作者基于对教育规律的理解，确立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促进年轻一代的良性社会化，适应、服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理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实验区对当时农村教育中的“多发病”“常见病”采取了有效的改革举措。现阶段，教育工作的主题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育理念现代化，我们的教育行为要以先进的理念为指引，力求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启示之三：不忘教育初心，保持教育情怀。“柯桥实验”是一群有教育情怀的人一起做着一件有温度的事。省、市、县教委主要负责同志，经常到实验区进行细致的工作指导，省教科所的专家直接参加实验区的教育改革。实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自觉主动参与实验，伴随着实验的进行他们自身也不断成长进步。“柯桥实验”告诉我们，教育情怀是创造教育业绩的重要动力。

启示之四：加强实证研究，繁荣教育科学。当前教育正处在迈向高水平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面临不少问题，解决问题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实证研究。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和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推动区域教育的科学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支持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社会组织面广量大，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十分重要。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

明确领导责任。中央对领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是明确的，但具体到一个层面、一个系统、一个区域如何落实好领导责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应尽可能厘清各责任主体的职责边界和相互关系，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确保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落实。

创新组织设置。社会组织人员分散、流动性大，一些社会组织专职人员少、党员更少，还有一些党员特别是退休聘用党员不愿意转组织关系，要建立符合党章规定、能够发挥好作用的党组织，工作难度很大。要针对社会组织现实状况，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建立健全党组织，合理设置党组织。要在继续抓好党组织覆盖基础上，突出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化；依据有关规定，探索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织，更好发挥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作用；积极推进在社会组织理事会层面建立党组织；依托行业协会商会建立行业党组织，对会员单位的党建工作进行指导；发挥“龙头”作用，打破单位界限，组建社会组织联合党委，加强党组织相互之间的联系服务和管理。

抓住“关键少数”。社会组织中的“关键少数”应包括两部分人：社会组织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党组织负责人。实践中，要积极探索抓住“关键少数”和靠“关键少数”来抓的实现路径，如推动社会组织决策管理层与党组织领导班子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提倡党员主要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尝试理事会对协会重大问题研究决策前先由党组织研究提出方向性意见，形成党组织决议，党员负责人要按党组织决议在理事会发表意见，把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充分融入进去、体现出来。

建强基层支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怎么样，最终要看党支部是不是坚强有力。建强基层党支部，首先要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要求，选好支部书记，配好班子其他成员。如果会长担任支部书记，一般要选配一名副书记，设支委的必须有一名纪检委员。上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分类指导，推动党支部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社会组织党组织职责，强

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社会组织党建

□ 罗建辉

化政治功能，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党员群众不断增强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建设强有力的基层支部，还要建立完善符合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特点的考核评价办法，落实有关政策，为支部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经费、场所等条件支持。

综上，我国社会组织虽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关系，找准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使党的领导真正融入社会组织发展全过程。

激发青年在互联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 王雪珍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人们对于更为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需求，互联网+技术被引入社会领域的速度也加快了，也助推了“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的步伐，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打破了政府的一元管理模式，更多的社会力量得以参与社区治理。为此，需建立健全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搭建好各种参与平台，充分挖掘青年人才的潜能，促进其主动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治理活动。

结合互联网技术加强宣传，增强青年主人翁意识。街道办、居委会可结合青年人的特点利用社区广播、社区宣传栏、社区QQ群、社区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多方动员呼吁“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主人翁意识，号召青年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要营造青年干事创业的宽松环境，对有想法、有冲动的青年要多压担子多给机会，增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荣誉感与责任感，让青年人回归社区，找回社区归属感、认同感，提升社区主人翁意识。

发展社区青年组织，加强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化保障。社区青年社会组织是指以青年为主体，基于成员共同意愿，自发形成、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它体现了青年的活力性、社会性、发展性，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体的重要纽带，也是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组织依托。因此

要大力促进社区青年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有效丰富的服务吸引和凝聚青年，引导青年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成成为创新社区治理的生力军。第一，社区要争取党委、政府部门、青联、青企协、学联、青年志愿服务协会等机构的支持，构建集“零门槛”接收、“专业化”辅导、“融入式”对接、“自治式”培育、“定制式”孵化等环节为一体的孵化机制，重点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公益理念、运行模式、项目设计、制度完善、团队建设等多元化的“栽培”服务，帮助社区青年社会组织规范组织结构，扩大影响力。第二，建立社区青年社会组织物质资源支持系统和组织管理、联络员机制，为社区青年组织提供资金、场地的便利，并进行政策上的倾斜和照顾，在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接管理与服务，增强社区青年社会组织的规范性、有序性和可发展性。第三，完善社区青年组织章程，健全组织内部运作和监督机制，打破组织负责人“一言堂”的局面，建立成员与组织利益相挂钩的机制，激发青年主

动参与的热情和意愿，保证其治理结构现代化。第四，培育带头人和骨干力量，提高社区青年组织的凝聚力。可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外出考察等途径，加大社区青年组织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力度，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增强他们自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第五，为社区青年组织提供更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机会，给予适度的物质或精神奖励，激励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工作。

针对青年人的个性和特性，依托互联网搭建各类社区治理活动平台。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机制，通过社区论坛、QQ群、微信群等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等媒介打造线上开放性交流平台，搭建青年民主参与、自由发声、建言献策的渠道。设计了一系列个性化、特色化活动，针对性地服务青年需求，拓展青年社交，反映青年心声，促进青年线下参与社区治理。如开展亲子类、兴趣类、创业类等公益服务活动，吸引年轻父母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并逐步积聚起年轻力量参与社区事务，让更多新生力量加

入到社区治理的队伍中来。同时，社区治理活动的设计要能降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本，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收益，有利于青年人以最少的成本参加，并能体现青年人在生活、工作中的实在利益，体现其参与行为的价值，增强活动的号召力。社区治理活动要多样化，吸引有不同需求的青年群体来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从而提高青年的社区参与率。

自治与动员互动，提升青年人集体行动力。目前的社区活动除了自娱性的文娱活动外，更多的是行政力量提供的与年轻人的参与动机和意愿相左的仪式性活动，在行政动员参与之外，很难激起青年的参与热情。而社区治理强调自治，体现社会的自治、自我管理和共同治理，提倡治理主体的多元，强调治理过程的互动性以及社区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市场要各尽其责，协调发展，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凌驾于社区之上，直接领导与控制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而是通过引导、协调加强治理过程中与其他主体的合作，激发

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促进各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性，提高各社区治理主体的行动力。要提升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集体行动力，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党团的引导和动员作用。通过传统媒体和现代互联网媒体平台加强组织宣传，结合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和青年居民的特性，以活动项目为载体提供政策扶持、资金资助、场地的便利等，提升组织动员力，推动社区青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另一方面加强社区自治，提升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这些力量的推动，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才能加强。

完善政策制度支持，建立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有效的激励机制。首先，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各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各社区的指导文件，保障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合法权益和合法地位。其次，建立公益项目资金和场地支持制度，对现有的公共部门购买服务、公益基金资助相关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结合社区实际公共需求，以菜单化方式推

出各类公益项目，定期召开“社团-社区”服务洽谈会，支持青年社团以项目化形式主动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并提供相应的场地和资金支持。最后，完善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考核评估与奖惩制度，政府部门、社区管委会等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社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进行动态管理与监督，并引入第三方对青年社区治理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评估结果落实到项目资助中去，并给予绩效优秀的项目承担者相应的荣誉表彰，可把青年社区治理骨干人才纳入到共青团系统激励评价和荣誉表彰体系，给予优秀的青年社会组织及其骨干更多待遇。如评选社区杰出青年、青年岗位能手等，选树更多的社区治理青年人才榜样，提升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建立社区社会诚信目录，将承接过程中有违法违规或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并设立惩罚机制，达到规范引导青年人健康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

